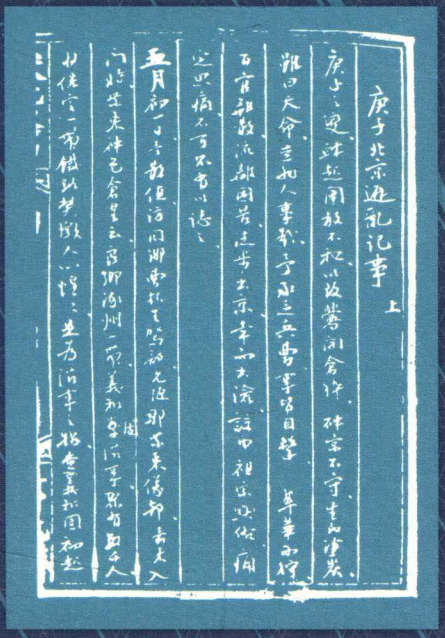
采铜文丛

晚清人物丛考

初编


庚子北京避乱记事 上

戴海斌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戴海斌 著

晚清人物丛考

初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人物丛考/戴海斌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9
（采铜文丛）
ISBN 978-7-108-06398-4

Ⅰ.①晚… Ⅱ.①戴… Ⅲ.①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 Ⅳ.①K8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5141号

责任编辑 王婧娅
封面设计 黄 越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 mm×965 mm 1/16 印张 48.25
字 数 763千字
定 价 128.00元(全二册)

自　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虽然和原先设想中的样子很不一样，但是，现在，“就是它了”（借用内子的话）！从博士毕业到现在，陆陆续续写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回头稍一检点，发现竟然有差不多超过一半的篇什，直接以人物为主题，或借由人物切入讨论某一问题。这大概可以反映个人研究的一些偏好，或者再大着一点胆子说，反映我在目前阶段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取径。那么，把这些文章收在一起，出一个集子，对自己来说，应该不算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吧。

中国史学一向强调以“人”为主，传统史书首重纪传一体，旨在“以人系事”“因事见人”。近世新史学的提倡者虽然对“二十四史”有强烈的批判，但仍重视精英人物的历史（史学）位置，如梁启超心目中的“理想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此处“伟大”，如取其“宏大”义项而不涉褒贬意，则亦可理解梁氏提示有所谓“历史的人格者”以“关系的伟大”而结合各“史迹集团”“时代集团”，有此提纲挈领，方可“将当时及前后的潮流趋向分别说明”。他本人所写的传记，也无一例外均以关系到一代时局者为主人公，如《李鸿章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之作，即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李鸿章传·序例》）。近代学术风尚与方法屡经迁易，“人物研究”

毕竟不完全同于“传记(传叙)文学”,而钱穆等人强调国史研究中“不当重事而轻人”“尤不当于人无褒贬”(《中国史学发微》)等观念,更多是对时流的一种防御性反拨。进入新时期以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一跃成为理解“历史的创造”之必然性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说明”),也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学界“论辩”的焦点之一(参看《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余风所及,直至80年代,“历史研究极为活跃,但研究得最多、最旺的还是历史人物”,不过像陈旭麓先生这样的思想敏锐者已在反思既存的问题,指出“我们研究近代人物,首先要掌握这个变的时代”,“要懂得此人的时代性,要有形象思维,没有这个,一定写得干巴巴;要有理论思想,否则写不深”(《陈旭麓文集第三卷·谈近代人物研究》)。迄于今日,日益倚重社会科学方法、凸出“问题本位”的史学研究,已渐不以人物为当然主角,更有甚者竟全然不见“人”的踪影,遂有学者感叹历史书写中“人的消失”,同时检讨由此形成的“一个矛盾现象”:一般民众渴盼读到有“人”的历史,专业史学界则反其道而行,认为愈没有“人”的历史,层次愈高,人名太多的历史是“软”的历史,反之才是“硬”的历史,只好把“人”的历史交给通俗传记作家或文史工作者(王汎森《人的消失?!——兼论20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不过,政治史或是较少的一个例外,据我所见,此一领域的研究者尚对“人物”抱有持续的关心,并在研究中不吝笔墨加以“深描”。在我更熟悉的晚清史研究领域,似乎有一种牢固的但确乎行之有效的以“人物”刻画“时代”的传统或风气,从民国到当代,从内地到港台,均受其沾溉,一般公认高段位的学人(有些人未必乐以“学者”自限),几乎很少例外地都在人物研究上下过功夫,且能拿出相当水准的代表之作。对于这种学术现象背后的脉络,我有一些朦胧的感觉,尚无法详晰表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已经对我的研究取向实际产生了影响。很早以来我就比较喜欢读人物自传、日记、书信、诗文集一类文字(不单纯出于研究目的),现在学校开课时也讲过“人物研究”的专题,多多少少写了一些人物(总体仍以“精英”为取向),对为何研究、如何研究也自然有一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思考，甚至还自主发明了诸如“中等人物”之类的概念（从较宽泛的角度，姑取其地位介于达官显贵与草根平民之间、知识阅历上往往具备传统与新学双重训练之意，我较注意这一类人物作用于历史关节点的机缘与影响）。此次相关论文有机会汇编成集，我一度妄想是否要专门作一篇文字，对迄今所思做一番发挥，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史学研究首重实证，见诸行事，方法、道理即默寓其中。“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有类空言制胜、华辩伤理；况且，吾辈所思是否真能“知意”，或有多少“创见”，自信尚不足，又何敢灌输于人。一本小书，值不得这样精巧的不老实，故终究还是决定守拙。

本书涉及的人物不在少数，而材料杂出，头绪纷乱，每一主题的论证处理，都绕不开史料考辨与史事考订的基础工作。“丛考”一名，古已有之，用之今日似略显老派，我却以为妥帖。近年来有两本案头书，常翻常新，深觉有味。一是陈垣的《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陈先生以“实习”方式讲授考寻史源之法，等于授人以渔，而“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二句金言读之难忘，令人心折。二是罗尔纲的《困学集》。这是罗先生晚年的学术自选集，由于成文年代的关系，收在集中各篇在今人读来，或不免一些政治说教的气味，但所展示的“假设”“本证”“辨伪”“笔迹鉴定”“调查”诸种考据手法以及史、论细部的精密结合，却有十足的“干货”。在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两位先生固曾就“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差别发生过辩论（见陈垣《〈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然若征名责实，既谓之“考据”，仍必有其不易标准在。以上两书均未特别标榜有何研究门径与取法，实际仍以问题为导向，所谓过河搭桥、逢山开路，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用到很多“方法”，自家武库的备用兵器本来就多，兼能上下取法，从而左右逢源。近代史料向称繁富，不惧其寡，但苦其多，或因如此，在利用方面往往不甚“精细”。然如果留心体察，“近代史研究”在史料考辨与史事考订方面实有其传统，凡有成就的学者，固非以考据自限，但在考据上必见其功力。清人焦循论“学”，以为“无所谓考据也”，“惟求有据，不能用思以求通者”必流入“考据学之末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焦里堂》）。此语针对的是

乾嘉时代的经学家“知据不知通之弊”，对后世学界也有其适用性，所以蒙思明在民国针对时风，直指“考据不能独当史学重任”，并呼吁中国的史学界“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诚然，考据或“不得别称一家”，考据非学问目的，本书之“考”，正如庄子笔下庖丁所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之“技”而已。吾于“道”，但有仰之弥高的憧憬，尚无钻之弥坚的执念。本书各篇之作，各具触因，亦或多或少有欲抒发者，套用现代学术语言，带一些“问题意识”“价值关怀”，然文章俱在，不必再赘，此处也不宜做何总括和阐发，我情愿承认一个朴素的想法：编这个集子不过为自验所学之深浅，止于“技”耳。按“技”，古训“巧也”。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康德也说过：“提供的一切规范不论多么详细，它的典范不论多么优秀，我们也不能学会灵气十足地进行创作。”（《判断力批判》第47节）孟子所说的“工匠精神”与康德此语指向的“诗艺”创作，未必在同一层次，但均提示了“规矩”或“规范”以内尚有不易把握、须实践体会者。我想自己不过是一个尚待检验能否出师的学徒，现在锻炼的是“技艺”，追求的只是那股子“巧”劲罢了。此处的“技艺”，非敢依傍或攀比西人所谓“历史学家的技艺”（The Historian's Craft），当然没有任何“新史学”包蕴的深意，只取其字面的原初意。窃以为这或许已成了我们习焉不察、久假不归的一类东西，只能在实践中摸索、锤炼，渐至打磨成型。本书也便是一个习史者经历初阶的记录。

近世精读清人文集大概最多（之一）的张舜徽，晚年做一总结，谓：“平生涉览清人文集，至于千家，而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具二者之长可以无憾者，特寥寥十数家耳，下者乃至词不达意，甚或文理不通，奚由能自抒所得？”（《爱晚庐随笔·文与学之分合》）以张先生之法眼，清人能为考证之文者，尚不过“寥寥十数家”，反观文史传统乖离日久、语文教育积重难返的今世，恐怕更是绝无仅有了。考证之作，或谓质胜于文，易失之偏枯、干燥，此似势所必至，却非理所当然。胡适讲人物研究，除了“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也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

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傅斯年尝以文学史写作为例，谈考证与著述之间的关系，其基调迥异于我们一般熟知的史料学观点：“写文学史当无异于写音乐史或绘画史，所要写的题目是艺术，艺术不是一件可以略去感情的东西，而写一部的史，应当有一个客观的设施的根基，所用的材料可靠，所谈的人和物有个客观的真实，然后可得真知识。把感情寄托在真知识上，然后是有着落的感情……希望诸君能发乎考证，止乎欣感，以语学始，以波涛动荡止。”(《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本人既是当代学院培养机制的产物，本书各篇概不免今日学术表述的诸种通病，我所努力的只是尽量“达意”，至少避免“不通”。不过，前述各家之言仍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我愿以之自勉，“发乎考证，止乎欣感”固是一种化境，却值得著史者去追求、逼近。

收入本书的一部分论文，在学术对话时设定了明确的对手方，表现于观点上且不无针锋相对处，用较早前史学界的专用术语来说，即带有所谓的“争鸣”性质。此或予以读者“好辩”的印象。我也只能承认修养不足，尚乏“逢古必敬、临文必恕”的一颗“虚心”。学术进展，譬如积薪，本书但凡有所见，无不得自先行研究的启迪和滋养，即使有所商讨辩驳，也绝不稍减我对他们的尊敬。我亦深知“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的道理。此前驳正他人的文章，今已见与本人再“商榷”者，此诚学者之幸，我要表达十二分的欢迎，同时提醒自己“以学心听、以公心辩”(《荀子·正名》)，时怀懔惧，下笔当更加矜慎。

本书中最早发表的文章，距今差不多也快有十年。本人由一个初出学术茅庐的懵懂青年，转眼到了该被人调侃“作法不自毙”的不惑之年，却全无一丝“悠然”的心绪。我很佩服许多前辈和同辈“不悔少作”的底气或勇气，但面对自己的文字再一次变成铅字的机会，还是未敢率由旧章。每次文章发表以后，多会即刻发现诸种不尽如人意处，而随着整体研究的进步、新材

料的出现以及身边师友的提点指谬，若一厢情愿地允许一仍其旧，有点近似于自我原谅(或欺骗)。所以趁此次结集出版，我还是花了不少的时间和气力，对入集各文尽可能做了修订和补订，个别文章的改动幅度还相当之大。若幸蒙读者垂注，无论批评指正，或参考引用，敬祈以此次收入本书的版本为准。唯尽管如此，仍有改不胜改之憾，如2017年末出版的上海图书馆编《张佩纶家藏信札》，颇多有价值的内容，我第一时间找来拜读，并对相关材料做了抄录整理，但交稿时限已迫，来不及做大篇幅的补订了。另附带说明，凡引文内由笔者订正或注释的文字，一律用圆括号括注，引文原注，一律用方括号括注。此次入集的文章，均以“人物”为题旨，因合计体量偏大，今姑总题一名，辑作初、二两编，这也是一个开放的做法，如果将来自己的学术兴趣不会很快转移的话，再积累若干，容或有三编之续。与收入集中的这些“人物”相关，本人也有两三个正在进行或接近完成的专题研究，希望不久后能以主旨更加集中、论述更加完善的专书形式呈于学界，接受检验与批评。

自知小书简陋，恐会有辱师教，但仍要衷心感谢我曾经受教的绍兴鲁迅小学、文理学院附中(师专附中)、稽山中学、兰州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各位老师，是他们用知识和人格形塑了今天的我。张克非教授、尚小明教授、茅海建教授，在我进学的不同阶段，予以直接引领与恳切教诲，受恩至为深重。感谢我曾经与现在服务的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收在本书的文章，十之八九都是在历史所工作时期写成的，现在想来，那段日子的意义，不仅在于给我研究、写作的优裕空间，而且助我形成了有关“学术”或“学问”的一些固定的看法。2016年入复旦历史系工作后，环境的变化使我有机会接受不同学术传统的熏陶，并且省思自己所在的位置与今后的道路，诸师长与同事惠我良多，没有他们的关心与支持，也不可能有这本小书的问世。一路走来，得到学院内外许多师友的教益与砥砺，我内心深知，正是因为他们的“挟持”，才使得习于怠惰的自己不敢不稍自振作，耻居下流。大谢不言，唯有铭感。本书最后定稿以及完成这

篇自序时，我正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访，这个静谧优雅的小院子，恰是当年北大求学时期历史系的所在。距离毕业将近十年以后，故地重回，在最初学术起步的地方见证第一本小书的诞生，对自己也是一个特别的纪念吧。

2018年2月10日 初写于沪上六平斋

4月20日 定稿于北大静园二院115

初编　目录

001　重审周立春："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诸问题考论
002　一、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动员加入了天地会？——兼谈地方志、史料的利用问题
008　二、周立春与罗汉党关系的几点辨正
014　三、重审周立春及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020　四、结语
025　甲午后"商办"铁路的一例实证——姚锡光日记所见之刘鹗
025　一、问题的提出：刘鹗与芦汉铁路
028　二、刘鹗由津入鄂
031　三、所谓"履祥洋行所保千万华股"之实相
034　四、张之洞与盛宣怀之利益联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39 五、盛宣怀得陇望蜀与刘鹗再度入鄂
042 六、无果而终
045 七、余论:“南拳北革”之间的“老新党”

050 张之洞与德国军事教习
051 一、从“教习”到“统领营官”:招募德国军官之始
056 二、姚锡光日记所见之“德员来春石泰”
065 三、辞聘“德将”引起的风波
068 四、武备学堂总教习法勒根汉辞职探因
077 五、采西法练兵:由师德而师日
081 六、结语

085 庚子事变时期张之洞的对日交涉
087 一、戊戌前后张之洞对日联络渠道
093 二、庚子事起:“讽日本维持大局”
100 三、战时交涉:“伊藤所询未易答复”
105 四、兵临城下:“请勿攻京城、勿惊两宫”
110 五、结语

114 庚子年张之洞对日关系的若干侧面
——兼论所谓张之洞的“帝王梦”
116 一、张权在日活动的实相
125 二、军事考察一行:派而复召
130 三、续聘日本军官:途生波折
132 四、谋购日本军火:行而未果
140 五、宇都宫日记所见之钱恂言论
149 六、结语

150 钱恂：晚清外交史上的“异才”
——兼证“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说难以成立
151 一、钱恂其人
155 二、身负数责的“留日学生监督”
160 三、与趋新人士的交游及言论
166 四、与张之洞之迎拒离合
172 五、结语

174 钱恂事迹补说
——从张遵逵先生的来信谈起
175 一、入张之洞幕府的时间及奉旨进京召见
180 二、出任学生监督背后的“日本因素”
185 三、与郑孝胥之间的隐性竞争关系
189 四、庚子年与张之洞反目的潜因
——兼论与宗方小太郎的关系
197 五、结语

202 也说义和团运动中的奕劻
203 一、五月二十日前奕劻之于“剿”“抚”的态度
——兼与荣禄比较
211 二、总署改组与所谓“督办军务处”的成立
218 三、“虎城密电”究竟何指？——从东南角度看“庆、荣”
224 四、奕劻在战时交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230 五、奕劻未随西逃是不是“慈禧布置的另一招高棋”？

236 六、结语

241 《乱中日记残稿》是否为“信史”?
——兼谈《袁京卿日记》的史料价值

242 一、《乱中日记残稿》《袁忠节公手札》《袁京卿日记》的版本与内容分析

250 二、对《残稿》若干“疑点”的辨析

265 三、袁昶日记所涉重要史事疏证

281 四、结语

284 《庚子北京避难记》的作者及其史料价值

285 一、作者是谁?

288 二、主体内容

291 三、史料价值举隅

298 四、结语

301 附 庚子北京避难记

320 也说 1908 年美国大白舰队访问厦门
——为马幼垣先生补充

322 一、中文史料所见之大白舰队访厦一行

339 二、再论大白舰队访厦的国际背景

347 三、小结中方得失

351 四、余话

重审周立春：“嘉定之变”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诸问题考论

160年前上海小刀会起义，除上海县城为主战场外，周边嘉定、宝山、青浦、南汇、川沙等地亦烽火燃烧。而时间上发生最早的嘉定起义，被研究者公认为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先导，并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扩张与高涨。当时亲历事变的嘉定绅士王汝润(1797—1868)在日记中写道：“嘉定之变，莫大于咸丰三年七八月间青浦周烈(立)春谋反。”[①]在较早前的一些论者看来，“作者系地主阶级出身，对起义颇多诽谤”[②]，但这一份从地方视角提供的历史记忆，或也可为宏大的革命史补白。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过程中，很明显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起义：一是上海附近各县的农民起义，一是上海县城内的游民起义。两者之间“互相联结，互相声援，但又有各自发动的原因和过程”[③]。概言之，上海县城中以粤、闽、浙籍客帮人为主的队伍与活跃于周边乡村市镇的本籍民众都曾卷入这场起义风暴，后者则以嘉定县南部的南翔、青浦县塘湾以及两县交界处的黄渡为风暴眼，以周立春、徐耀等人为首、活跃于当地的地方力量，构成了上海县城之外起义队伍的骨干。关于他们的历史，长久以来被革命化的宏大叙事所笼罩，他们的形象、作为及施于地方的实际影响，诸多环节仍然模糊，如重新检视史料，实有不少问题值得

① 王汝润：《馥芬居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074页。

② 王汝润：《馥芬居日记》“编者按语”，《汇编》，第1074页。

③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94页。

进一步讨论与反思。

一、周立春是否经刘丽川动员加入了天地会？——兼谈地方志、史料的利用问题

“上海小刀会起义”这一出于今人定义的名词，实际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究其源流，极端复杂，而人员构成，有谓“帮内有帮，帮外有派”④，至于起义过程也是分分合合，一波三折，远非单一线索可以概括。既有历史叙事为突出革命阶级“联合斗争”的意义，往往过分地强调他们在组织和性质上的“统一性”，如谓：“上海的刘丽川、潘起亮和嘉定、青浦的周立春、徐耀等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兴安泉漳会馆董事李仙云等，结成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这个革命的秘密组织就是小刀会。”⑤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为周立春立有专传，谓其“加入上海小刀会，与刘丽川等同谋革命”“为着赶快响应太平天国，决定发动苏南农民和上海市民在八月起义”。⑥ 郭豫明著《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一书，据清朝档案的线索，指出“上海小刀会”内部实际存在着分别以周立春和刘丽川为首的两个派系。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现，惜郭先生只是在一条注释中简略处理了这条资料⑦，并未继续追索史实，该书的论证仍然以周立春为小刀会成员为前提，认为起

---

④ 盛巽昌：《帮内有帮，帮外有派——点评上海小刀会领导层》，傅一峰、华强主编《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第339页。

⑤ 《上海小刀会起义综述》，《汇编》，第10—11页。

⑥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四册，中华书局，1991，第113页。

⑦ 该条注云：“1987年底，我赴北京故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档案，在《两江总督怡良奏周立春解省审明凌迟处死折》（咸丰三年九月初一日，军机录副奏折）的附件中，发现了周立春的两个印章拓片：一为‘提督本标全部大元帅’，一为‘统理军机’，喜出望外；可惜其中的另外两个附件，即一份周立春供词抄件和一份周立春告示抄件，却在1953年6月4日整理档案时就注明‘缺’了。这两个印章所表示的周立春衔名，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完全相符，为目前见到的资料所未载，极为珍贵。他的衔名同刘丽川相等，均为大元帅，促使我对起义军的内部组织状况进行探索，从而分辨出其内部实际存在着一个以他为首和另一个以刘丽川为首的两个派系，彼此的职称不尽一致，组成人员的成分也有差别。”参见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3，第81页注释2。

义前夕周已经“在刘丽川的动员下”加入了天地会，“这样上海小刀会就同青浦等地农民建立了联系，并在他们之中扩张自己的队伍，从而壮大了力量”。[8] 周育民、邵雍合著《中国帮会史》侧重讨论上海小刀会起义前夕帮会的分布和演变情况，以嘉定罗汉党为土著力量，而将青浦周立春纳入广东帮天地会的势力范围，也认为各帮派及秘密结社相互结合，“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上海小刀会”。[9] 2003年王继杰、黄岸青论文更多注意到周立春队伍“在抗阻抗赋斗争过程中形成壮大”这一社会背景，对其初期是否已经是天地会或“帮”“党”“堂”等秘密社会组织表示怀疑，一个重要理由是：“在小刀会起义之前的武装对抗过程中，官方并以会党视之，虽然，他们在民间承担了与之相仿的职能。”不过，该文仍然延续了嘉定起义者与上海县城的小刀会“达成联盟”的传统观点，相应举证包括二者“约期举事”，周立春“在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的第二天率兵四千前来支援”，等等。[10]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周立春最早与广东天地会发生联系，学界公认缘于当地鸦片贩运引起的一次土客冲突。咸丰三年(1853)六月，广东嘉应州公所董事、天地会成员李绍熙(又名少卿)[11]由上海贩运一批鸦片烟至苏州，途经青浦黄渡镇，为当地监生金仁保率众劫夺，李绍熙往见周立春，求还所掠，周遂命金仁保等人将鸦片烟土悉数归还。关于这点，多种史料都有相似的记载，而其中成文最早、叙事最详的诸成琮《桑梓闻见录》，对这件事的结果仅谓“广东人素闻烈春(即立春)名，至是益信其为众所服。其魁王国初、李少卿遂深相结，推以为主”[12]，并未语及周立春结交刘丽川、归附天地会的情节。

前揭著述论证周立春加入天地会，常引材料主要来自地方志。如民国

---

⑧ 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74页。

⑨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第192页。

⑩ 王继杰、黄岸青：《上海周边乡镇小刀会起义论析——以嘉定、青浦地区为例》，《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第225—226页。

⑪ 李绍熙性多变，一生投靠多方，人谓“反复狡猱，自负枭雄”，其相关事迹可参王韬：《瓮牖余谈·记李少卿事》，《汇编》，第1024—1025页。

⑫ 诸成琮：《桑梓闻见录·周烈春据城始末》(1909年嘉定学会丛刻本)，《汇编》，第1055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